大宗协议取消与学术出版：来自教职人员和研究生访谈的见解

Madelaine Hare[1], Philippe Mongeon[2], Samuel Cassady[3], 和 Catherine Johnson[4]

[1]maddie.hare@dal.cahttps://orcid.org/0000-0002-2123-9518信息科学系，Dalhousie University

[2]pmongeon@dal.cahttps://orcid.org/0000-0003-1021-059X信息科学系，Dalhousie University，Centre interuniversitaire de recherche sur la science et la technologie (CIRST)，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3]scassady@uwo.ca
https://orcid.org/0000-0001-7033-3458
Western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4]cjohn24@uwo.cahttps://orcid.org/0009-0002-5328-9437信息与媒体研究学院，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通讯作者：maddie.hare@dal.ca

关键词
大宗协议取消；学术出版；馆藏管理；教职人员；研究生；学术图书馆；拆分；期刊订阅

摘要
面对订阅成本不断上涨、馆藏预算日益缩减的局面，学术图书馆员越来越多地取消大宗协议。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图书馆员的决策过程和沟通策略；本研究则通过对加拿大三所中等规模机构的教职人员和研究生进行访谈，旨在了解他们对取消大宗协议的看法与体验。本研究将取消视为信息交流的协作过程，而非自上而下的流程。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大宗交易的切身体验及当前学术出版的状况，并据此思考如何开展取消项目。

1. 引言
“大宗交易”一词由 Kenneth Frazier 于 2001年提出，此前电子期刊套餐已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问世（Frazier，2001）。在数字出版兴起的推动下，商业出版商为学术图书馆提供了在多年期合同下购买期刊订阅套餐的选择

，这看似是一种务实的节省成本措施，能够比逐种购买更快地扩充馆藏（Mongeon 等，2021）。大宗交易还通过减少图书馆员需要管理的许可和访问平台数量，提高了电子资源管理的效率（Glasser，2013）。全球许多图书馆利用了大宗交易的机会，另一些则选择继续按需逐种购买期刊订阅（Bergstrom 等，2014）。选择签订这些许可协议的图书馆，在随后几年面临不断上涨的订阅成本，超出图书馆年度采购预算，因此不得不为了财务生存而取消这些大宗交易（CARL，2016；Hoeve，2019）。

大宗交易的取消或“拆分”通常并非界限分明的行动，也不只是简单地终止或不续签订阅合同。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由预算紧张所触发，并需要采取削减成本措施（Ivanov 等，2020）。图书馆员通常会权衡期刊的价值（一般依据多种使用情况指标）与其成本（Jurczyk 和 Jacobs，2014；Botero 等，2008；Lemley 和 Li，2015）。这一过程通常复杂且耗时，需要以数据驱动的决策为基础，并辅以教职人员的定性见解，了解他们认为哪些资源对研究与教学最为必要（Enoch 和 Harker，2015；Hardy 等，2016；Gagnon，2017；Hoeve，2019；McLean 和 Ladd，2021；Ambi 等，2016）。图书馆员通常会与负责管理这一过程或对期刊削减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图书馆高层管理人员或机构管理层协作。图书馆员会在决策过程中或之后，就图书馆的期刊取消开展战略传播；他们往往借助学科联络馆员的专业知识及其与教职人员的关系，以得体且有效的方式进行沟通（Johnson 和 Cassady，2024；McLean 等，2021）。

期刊订阅和取消项目存在于当前学术出版系统的背景之下。读者出版协议和开放获取模式等新发展，会影响学者如何应对学术出版领域，并影响他们对大交易取消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研究发现，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对学术出版十分感兴趣，但相关知识不足，尤其缺乏对订阅和出版费用的了解（Owens & Manolovitz, 2021; Schiavo, 2024; Welhouse & Boock, 2023）。对学术出版的认知和了解程度，会影响教职人员和研究生的出版行为，以及他们对取消项目的看法和反应（Lusk et al., 2023; Webber & Wiegand, 2022）。

过去几年，高等教育机构开展的取消项目引发了教职人员和学生的各种反应。例如，渥太华大学在2016年的削减，引起了人们对研究人员能否有效开展工作的担忧，以及对该机构声誉的顾虑（Mills，2016）。纽芬兰纪念大学取消期刊订阅，也引发了人们对研究生能否完成研究的担忧，并让人猜测资源访问权限的丧失会如何影响未来学生的招募（Howells，2015）。在卡尔加里大学，尽管教职人员的震惊导致人们对取消订阅陷入恐慌，校方却将削减描述为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有针对性地采购资源，以满足教职人员的兴趣；同时也强调了其他获取途径（Strasser，2017）。

McLean等人（2021）指出，面向教职人员和学生开展传播活动，能够显著影响人们对取消审查和相关决策的理解与支持程度。事实上，人们的反应往往与校园社区对学术出版面临的挑战及其对学术图书馆造成的经济影响的了解程度相呼应（Olsson等人，2020）。

1.1 研究目标

过去二十年来，图书馆员作为服务导向型从业者，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在取消决策中更好地征询教职人员和学生的意见，向他们说明取消的必要性和流程，并以策略性的方式传达信息，既让教职人员了解情况，也使他们确信取消不会对其学术活动造成不利影响（McLean 等，2021年）。本探索性研究旨在细致了解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对学术出版及其所在机构的大交易取消项目的认知、知识、看法和相关经历。本研究将大宗协议取消视为信息交流的协作过程，而非自上而下的流程。本调查是一个大型项目的一部分（Johnson & Cassady，2024；Cassady 等，2025），该项目考察加拿大大学的大交易取消流程。

2. 方法

2.1 数据收集与处理

2.1.1 招募

数据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收集。访谈以英语或法语进行，受访者包括三所中等规模的加拿大大学中的6名大学教职人员和7名博士生（其中一些人也担任讲师或兼职教职员工），访谈时间为2020年至2022年（表1）。研究人员通过电子邮件邀请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参与访谈。

表1. 受访者概况

大学	受访教职人员	受访博士生	总计
Lyra U	2	3	5
Orion U	1	1	2
Andromeda U	3	3	6
总计	**6**	**7**	**13**

高等教育机构和访谈参与者的姓名均已匿名处理，所有出版商名称也已省略。请注意，参与者代号表明了其所属机构（首字母：L、O 或 A）和身份（F 代表教职人员，G 代表研究生），例如：参与者 L3G 是 Lyra U 的一名研究生。

2.1.2 访谈

同意参与本研究并接受录音的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博士生）通过 Zoom 参加了时长为 30 分钟至 1 小时的访谈。研究团队的两至四名成员共同进行了访谈（见附录A）。录音使用在线转录服务 Scribie（https://scribie.com/）转录。其中六次访谈由法语研究助理转录。其中三次由研究助理转录成英文，另外三次由 DeepL 软件翻译成英文（https://www.deepl.com/en/translator），并由法语研究助理核查准确性。

2.2 数据分析

2.2.1 编码手册编制与编码过程

访谈转录稿由研究团队至少两名成员在 Excel 中进行编码。编码手册通过仔细阅读访谈转录稿，并与研究团队进行讨论后编制。研究团队对反复出现的模式进行整合，以确保一致性，直至就九个广泛主题达成共识：参与者、对期刊危机的认知、获取、与图书馆的联系、取消项目、期刊价值评估、成本、开放获取和当前出版模式。这些主题涵盖39个子主题（附录B），并用于对访谈转录稿进行编码。

2.2.2 主题分析

对编码数据进行了主题分析，以确定访谈参与者讨论的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概念（Urquhart等，2010）。Clarke和Braun（2016）阐述了主题分析在“旨在了解参与者的想法、感受和行为的体验性研究”中的用途；这种方法可用于对规模较小的异质数据集进行归纳分析，并捕捉显性与隐性意义（第297页）。这项分析细致地揭示了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对所在机构大交易取消的认知、知识、看法和经历。

2.2.3 统计摘要

主题使用 R 统计软件（4.2.1；R 核心团队 2022）生成，并显示每位参与者 A describe 该表显示了每个主题的受访者提及次数（每位访谈参与者各计一次），表明所有参与者都提及了每个主题。获取的每位参与者平均响应率最高，其次是期刊价值评估和当前出版模式。有趣的是，获取、当前出版模式和期刊价值评估的标准差（sd）最高，这意味着一些参与者可能会频繁提及这些主题，而另一些参与者提及得很少。这一点可通过最小值和最大值响应看出：获取的标准差最高，一位受访者提及了30次，而另一位仅提及4次。成本、开放获取和对期刊危机的认知的响应率较低且标准差较小，这表明参与者可能认为这些主题的重要性较低，或对这些主题的了解或认知较少。

表2. 各代码响应的统计摘要

Code	n	均值	标准差	var	最小值	第一四分位数	中位数	第三四分位数	max
获取	13	14.769	8.852	78.359	4	9	11	21	30
期刊价值评估	13	11.000	4.983	24.833	4	7	10	15	21
当前出版模式	13	10.769	4.106	16.859	6	8	10	13	20
与图书馆的联系	13	9.615	4.350	18.923	5	6	10	11	20
取消项目	13	8.308	4.733	22.397	2	5	8	10	20
Cost	13	7.538	4.352	18.936	2	4	8	10	15
开放获取	13	5.231	2.713	7.359	1	4	5	6	10
对期刊危机的认知	13	4.385	3.280	10.756	0	2	4	6	12
参与者	13	3.462	3.126	9.769	1	1	3	5	12

注：参与者主题（包括职位、院系或学院、从业年限和研究领域等子主题）用于识别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并为编码后的回答提供背景信息。为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本分析未呈现这些数据，但这些数据有助于解读各主题的响应。

3. 研究结果

本节首先对访谈数据的结果进行统计摘要，从宏观层面概述参与者所涉及的主要主题。研究结果按八个较广泛的主题分节呈现，并结合参与者的响应加以说明，以细致展示教职人员和学生对每个主题的看法及相关经历。我们有意选取最具启发性和代表性的响应，以反映数据中的显著模式，突出普遍观点或与之相左的意见（Lingard，2019年）。

3.1 对期刊危机的认知

3.1.1 对期刊危机的认知与了解

研究人员询问了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对学术出版中普遍存在的高利润商业模式的了解程度；这是理解大交易取消的必要性及其影响的重要背景。受访者的了解程度各不相同，有人几乎一无所知：“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获取一份期刊要花多少钱。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里的利害关系是什么”（A5G）；也有人有大致了解：“我知道这要花一大笔钱，而且大型出版机构非常贪婪，拥有极其赚钱的商业模式——我们免费为他们工作，然后他们转过头来向图书馆收取荒唐的高价”（A4G）。少数参与者能够区分单刊订阅和捆绑定阅，但不确定它们具体如何运作（L1F；L2F；L5G）。一些人表示对这一问题一无所知，并指出这根本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内（L4G）。

一些教职人员认为，同事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普遍较低：“我不知道有多少同事知道有批量订阅这种方式”（L1F）。另一位参与者提到：

> “我有点失望，主要是因为我对学者和大学如何运作只有那么一点了解……这些年来我逐渐意识到，真正关注这些事情的人似乎只有我一个”（O2G）。

一些参与者对这场危机的认知仅限于大学面临的财务压力：

> “不，我了解得很模糊，但我知道他们需要、获取订阅，并通过这种方式处理期刊。我知道我们学院有一位嵌入式馆员，会为我们学院以及其他学院的教职人员提供咨询，显然是针对需要图书馆服务支持的研究领域。不过，至于商业模式以及他们如何运作，他们从中央大学获得预算。我所了解的也就这些了”（O1F）。

不过，他们对具体细节并不清楚：“我知道价格，但不知道具体数目。我大致了解一些，不过也知道有套餐协议，因为你订阅 Routledge 的期刊，但你知道，订得越多，就像其他事情一样，折扣也越大。但除此之外，你知道，假设 Routledge 的账单是五十万美元，还是二十五万美元？我完全不知道”（A6F）。

教职人员和学生对其他大学应对期刊危机的举措也有所了解（A6F；A5G），尤其是那些引起更多关注的事件，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抵制某些出版商并随后取消订阅（O1F；O2G）。受访者 O2G 希望这类更大规模的举措能促使其他机构采取类似行动：“我认为，大学目前取消许多此类订阅的做法，希望能有所帮助。”因此，采取行动抵制价格敲诈的机构规模及其声誉，也被认为对鼓励其他机构效仿具有重要意义。

3.1.2 教职人员如何获知期刊危机

教职人员了解期刊危机的信息渠道包括各自所在的机构、高等教育杂志、社交媒体平台（即 Twitter，现称 X），以及学科内部的交流。这类信息共享通常只是“没什么特别实质性的内容，不过就是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多是在 Twitter 或社交媒体讨论中，或与大学其他地方的人交流，比如图书馆员，以及更广泛的普遍讨论，但没有特别局限于本地的内容”（O2G）。

教职人员也往往从图书馆员那里获取信息：“总之，我做的就是跟他们聊聊，这样就能听到一些小道消息”；或者在图书馆里，“有时候我的学生以前在图书馆工作，他们会无意间听到一些事情”（L2F）。职业关系或学生关系也是信息来源：

> “我是 eCampusOntario Fellows 最初成员之一。所以，我们曾专门深入批判过期刊的商业模式，比如：‘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为这些东西付费？毕竟，所有正在开展的工作都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L3G）。

一名博士生指出：“[……] 我有机会参加院系会议，前后将近两年。我从未见过教职人员讨论过这个问题”（A5G）。这表明，沉浸于

并依赖某些体系，可能导致人们缺乏认知；而置身体系之外的人往往更能清楚地察觉这一点。

3.2 当前出版模式

3.2.1 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对学术出版系统的态度

每位受访者都认为学术出版系统简直荒谬，将其称为“一个从公共资助的群体身上牟利的寄生系统”（A6F）、“令人震惊且可耻”以及“非常贪婪”（A1F）、“捞钱”（L2F）、“极其混乱不堪”（L3G）；他们还指出，“这些期刊订阅的成本高得离谱，说实话简直愚蠢”（O2G）。一位受访者表示，“对于这种成本中似乎显而易见的公路抢劫式收费，我感到目瞪口呆……”（O1F）；另一位则认为，“我想不出还有哪个行业会让别人付钱给你，然后再去为另一家营利性公司提供免费劳动……这太疯狂了”（O2G）。L1F指出，“学术出版商的利润率在所有领域中都是最高的之一”。O1F注意到，“这些出版商本质上是在恩将仇报，反咬养活他们的手”。受访者还提到了“盗窃”的概念（A1F），以及“重复获利”的做法，即出版商从同一项工作中多次获利：“社会为我们的工作支付了四次费用。我们觉得这有点过分”（A2F）。

教职人员和研究生不满的另一点，是他们认为高昂的费用并未带来额外价值。人们认为，数字出版的兴起应能降低或消除成本，因此参与者觉得，他们理应获得比目前更高质量的评审和编辑服务。许多人指出，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大学的学者完成的：“期刊的编辑在大学工作。发表这些内容的人在大学工作。进行同行评审的人也在大学工作。这些人都由大学支付薪酬，他们做这些事大概是为了充实自己的学术履历”（L3G）。A5G简明地概括了当前的状况：“教授由大学支付薪酬来开展科学研究，研究成果由出版物验证，而大学还得再把这些出版物买回来。这简直荒唐。”

此外，受访者认为，当前的体系助长了不合理的产出速度：“或许这算不上过度生产，但科学文献的产出确实过于泛滥。之后还得为这些成果寻找发表渠道”（A3G）。一位受访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体系造成的后果，但并不完全反对营利性出版，只是认为必须加以规范，以确保其不会被过度资本化：“我不反对……那些赚取少量利润的商业出版商……这完全是个度的问题”（A2F）。人们认为，这种高产出速度还催生了学术出版领域其他值得质疑的做法：

> “我们将其与布迪厄的著作进行比较……或许正是这一点，实际上促使许多人在文章中大量引用。稍微转动一下轮子，为了被引用而引用。因此，对此我相当批判。至于这与商业模式究竟有多大关联……我想可能有一点关系”（A3G）。

A2F 表示：“嗯，我想说，我们也可以照照镜子，看看日益严重的过度发表倾向，以及眼前这个怪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它。

即使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也不太确定我们是否采取了多少措施来阻止它。”从本质上说，出版系统被描述为一个正反馈循环，因为出版商最终“制造了依赖”（A6F）。

3.2.2 推动变革的方式

许多人认为，由于变革深植于学术交流体系之中，因此推动变革十分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显然，这套体系已经根深蒂固……存在很多问题。因此，要让体系发生变化很复杂”（A5G）。一些人认为，变革需要自上而下推动，并通过立法来规范出版业：“这些都是大型出版商。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寡头垄断。他们仍然掌控着相当多的事情。因此，除非……有法律出台，或者联邦政府介入”（A6F）。L4G也呼吁政府干预：“我认为这应该由政府来做。我认为这完全可以采取集体协作的方式。但这样会造成经济不平等……如果我们希望研究成果对人们有意义，就需要让他们能够获取这些成果。”一些参与者认为，出版工作应由学术机构运营，例如大学或资助机构（L3G；L2F）。

在那些认为改变更容易实现的人中，A6F 表示：

> “那个系统本来就不该真正存在，因为它否定了我们所做之事的根本起源……这几乎是世界上最容易改变的系统之一……当你看看是谁在做这些工作以及其他一切时，你会发现是我们。即使去掉那些人，我们仍然在这里。90%的工作都是我们做的。”

他们将重新购买那些由公共资金资助、却仍然无法获取的研究描述为“卡夫卡式的”（A6F）。

一名研究生知道，其所在机构规定必须采用开放获取：

> “我知道，人们正在从全球层面反思获取问题。我知道，现在 Andromeda U 正在推动……我知道这是他们的政策，所以我知道他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进行反思”（A5G）。

参与者 A6F 强烈认为，改变不应与出版商协商，而应由作者夺取：“你不会和他讨论他的灭亡条件，而是消灭他，然后说：‘看，这些年来你仍然赚了不少钱。’”A5G 认为，这是因为出版商故意让其系统含糊不清、难以理清：“而且我确实有这种印象……他们对这种不透明性感到相当自在。”

O2G认为，个人行动的影响力有限：

> “人们可以采取一些个人行动，比如不再为某些期刊审稿，或选择不在某些期刊上发表文章之类的。但个人行动的作用终究有限。”

A2F建议，不要指望变革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尤其是在以人文主义方式推动变革时：

> “我认为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当然，如果你有一整个编辑团队，未必想一夜之间就把他们解雇，尤其是因为你认识他们。所以，如果这项转型需要……十五年才能完成，尽管从技术上说两年就能完成，那么只要考虑到这些人，我就不会反对。”

除了重新审视现有的出版模式，教职人员还讨论了改变学者在这些模式下进行出版的行为有多困难。他们认为职业生涯早期研究人员处境更加脆弱，因此一位参与者认为，推动变革是资深教职人员的责任：

> “……这必须由你所说的精英来推动，实际上是那些年长的人……那些处于职业生涯某个阶段、不再依赖出版物的人。我不认为博士生协会会为此积极倡议，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有危险”（A2F）。

L3G认为，主要问题仍然在于说服教职人员改变习惯，因为现有的评价体系规模庞大，而且学术生存也有其需要：“问题在于，教职人员想在大学获得终身教职……许多已形成的体系都支持这样一种观念：要把出版物发表在那些非常成熟、影响因子很高、但设有付费墙的期刊上。”不过，A6F注意到，评价用途的定量评价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 “我们院系也开始尝试以同样的方式思考。我在汇总数据和晋升档案中都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不太看影响因子了，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发表过’。如果你在自己的领域发表过，那么你知道，我们会问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想开始玩那种游戏，说什么——因为一旦你开始量化一切，你知道，我的意思是，这根本没有尽头。所以，我们尽量在自己的评价中抵制这种做法。”

3.3 成本

3.3.1 对导致取消订阅的财务因素的认识

大多数教职人员和研究生都知道期刊订阅价格昂贵，但对具体成本并不确定。有些人曾调查过期刊成本：

> “我大致了解一些，因为有时……我会看到订阅价格……你知道，有时你会忍不住说：‘天哪！’有的要 1000 美元，有的要 5000 到 10000 美元。而且问题是，并非所有期刊都会公布价格。”（A6F）

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种信息不透明：“如果我去看《传播与组织》，在期刊首页会看到：‘如需订阅，请联系……’他们甚至不标价格。”（A5G）许多人并不了解图书馆的预算，即使这些预算已经向他们公开也是如此（O1F）。

少数受访者了解到，他们所在机构的预算削减随后影响了他们获取期刊的能力（O1F；O2G）。一位教职人员意识到，自己对这一情况的了解（得益于一位善于沟通的图书馆院长）或许并不普遍：“我们比普通教授更了解预算情况，可能也更在意预算”（O1F）。他们接着说

> “我听到他们把问题归咎于预算；他们是否明白成本高得惊人，是因为……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出版机构，同时大学预算也有所削减。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明白额外支出究竟从何而来，但我认为他们明白，基本上别无选择”（O1F）。

一些参与者对图书馆在取消大交易时所处的困境表示理解，并指出预算削减并不意味着大学不再重视他们的工作，而是体现了有效的财务管理：“所以，我不认为无法获取这些文章说明他们不支持我的研究；我认为这完全是预算问题，是一种成本效益分析”（O2G）。

有些人态度矛盾，承认财务可行性与机构责任之间存在张力：“我知道这非常非常昂贵，所以我批评事情时会很谨慎，因为我们的资金有限”（L5G）。

3.4 取消项目

当被具体问及取消项目时，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对征询意见的方式和／或取消通知的传达方式表达了各种看法。这些流程中的疏漏所造成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获取变化，都强烈影响了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对取消的态度。

3.4.1 如何传达取消消息

关于取消项目的沟通方式各不相同。疫情前，信息共享更多通过口耳相传进行（L2F）。取消通知通过电子邮件、机构网站、社交媒体和信息说明会发布。图书馆领导层和联络员因在与教职人员沟通方面特别有效而受到称赞：“我们的图书馆院长确实做得非常周到，努力向我们说明事情为何发生；而且，由于我们有嵌入式馆员制度，这有助于传达信息”（O1F）。同样，参与者 A2F 认为他们的图书馆馆长很有说服力：

> “随后，他非常清楚地阐述了其中的原因、促成这一决定的计算过程，以及如何通过这样的话来精准缓解其影响：‘无论你们提出什么要求

，我们都会分批订购，然后重新评估成本。'这一切都经过了极其周密的考虑；在我当时看来，建立新的权力关系似乎是必要的"（A2F）。

教职人员反过来尝试支持此类努力："她作为学院院长来找我时，我总是抽时间把她列入任何会议的议程……我认为这至关重要"（O1F）。其他人则发现相关沟通有所欠缺："我们确实和图书馆服务部门开过一些会，但这从来不是会议讨论的内容……也没有人直接告诉我们：嘿，你们将不再拥有获取权限"（L3G）。

教职人员和研究生也通过偶然情况了解到取消，例如 在研究过程中无法获取某些出版物时（L4G）。 参与者 O2G 认为，如果教职人员正在积极开展研究，他们势必会发现这些取消："他们会进行研究吗？当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法获取时，我总是感到疑惑；这总是让我着迷。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遇不到这种情况。"一些人通过本研究了解到其机构的取消情况：

"[当这项研究的邀请发出时，我才第一次听说有些内容被取消了。我当时想：'什么，真的吗？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无法获取某些内容。'"（L3G）

L5G指出，他们只希望收到与自己领域相关的取消信息：

"我不想听到每一项取消的信息，只想了解健康科学文献方面的……但要弄清楚谁需要知道这些信息，可能都很困难。或许可以……在图书馆网站上设一个网页，公布当前状态；如果对取消事项作出了决定，就可以在那里发布。"

学生们觉得自己并未及时获知相关情况：

"大多数时候，当你和我们的导师交流时……并没有人问：'嘿，你们现在找资料有没有遇到问题？这些变化是否影响了你们的研究，以及你们能够获取的内容？'所以这个话题从来没有被提起过。"（L4G）

3.4.2 对取消的态度

参与者对大交易取消的态度从恼怒到强烈反对不等，但这并未改变他们对图书馆的态度。一些人提到了自己获取信息的权利："我在理念上反对这种做法，因为我们正在……当你无法获取范围广泛的期刊时，感觉几乎就像遭到审查"（O1F）。一些参与者，如 L2F，则表达了对取消的反对：

"前段时间我们收到一封信，内容看起来无伤大雅，大概是问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你们服务之类的……我告诉所有人：'天哪，他们要削减了。'他们才会问这个。你知道，我们没那么傻。我知道

这套套路。我见得多了。‘我们不会削减，但你们能告诉我们想要什么期刊吗？’我说：‘全都要。’”（L2F）。

参与者普遍觉得自己缺乏能动性：“到头来，我几乎没有办法利用大学提供的服务”（A3G）。L2F觉得他们缺乏有组织的行动：“你能怎么办，拿起铲子去追他们吗？我们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不能罢工，那还能怎么办？”A6F解释道：“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意见一致，也就是说，没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这样的体系。”

一些教职人员对期刊取消持积极态度，因为他们抵制营利性出版：“我的反应大概会是：‘啊，太好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撤出[publisher]，做得不错。’然后我就会继续做自己的事”（L1F）。

3.5 获取

3.5.1 资源获取的替代方式

在应对大交易取消时，维持访问权是一项关键考量。教职人员通过各种方式减轻访问权丧失带来的影响，而这些方式各有利弊。提交馆际互借（ILL）请求是最常见的做法之一，有人赞赏其便利，也有人不喜欢其繁琐。O2G指出，多花几分钟“在线搜索”或多等一天收到文章，仍然能让他们免去一趟图书馆之行；而LG3则认为，馆际互借是一个“令人头疼”且耗时的过程。参与者使用其他获取方式，不仅受到获取资源这一动机的影响，也取决于数据可能如何影响决策。一位受访者表示，自己坚持提交馆际互借请求，是为了向图书馆员提供数据：“如果……是我特别想获取的某一期刊上的文章，我会尽量……通过图书馆本身提交请求，这样他们的系统里就会有相关信息，知道研究人员正在尝试获取某些刊名”（O2G）。一位研究生指出，在通过替代途径获取资源时，他们仍会为某项资源提交请求，“至少留下记录，这样图书馆就能知道相关信息；否则我意识到，如果图书馆不知道有人需要这些资源，他们就不会掌握相关数据”（O2G）。L5G表示：“我知道这些使用情况会被追踪，所以我会尽量选择一个护理学数据库，为我认识的、想要支持的内容增加点击量。”

另一种常见的信息获取方式是联系文章作者（A5G），这也发挥了社交联络机制的作用：“其实，我可能想联系作者，是因为这与我的研究非常相关，而且无论如何我都想建立联系”（O2G）。有些人发现这样效率更高：“我联系了作者。我找到了她，她来自澳大利亚，于是我给她发了邮件；不到一天，她团队里就有人给我回了邮件”（L5G）。有些人则依靠更深入融入研究体系的导师，不过，L3G 的情况表明，研究者与期刊的距离有时并不会影响他们获取期刊内容的能力：“我的论文导师在那本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我当时就说，‘我无法获取’，结果她也无法获取，所以她就给作者发了邮件。而且她还是该期刊的一位编辑”（L3G）。另一些人则把获取工作交由行政支持人员处理：“我把想要的文章发给她，然后她就把链接发给我……我觉得她是在和其他图书馆员协调安排，然后大家好像组成了某种共享资源池”（A1F）。

受访者还会使用自己所属机构的其他凭证，来获取其目录中的内容（O1F、L5G）。

除了社会关系之外，参与者还依赖图书馆在线目录之外的信息技术：他们通常使用 Google Scholar 等搜索引擎（L3G），而其他人则因非法网站 Sci-Hub 的速度和易用性而直接使用它："最糟糕的情况下，我曾经碰巧浏览过一些质量可疑的俄罗斯网站。但从政治角度来说，我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所有这些研究都是由公共资金资助并公开开展的"（A6F）。ResearchGate 也被广泛使用，不过一些人指出其并不稳定："通过 ResearchGate……你可以获取其中一些已经开放获取的文献……但对于其他文献，你实际上必须请求个人向你提供访问权限……它非常不稳定"（L4G）。这种不规则性影响了研究人员对学术图书馆的使用，也使他们在将其作为首要搜索地点时更加谨慎：

> "我会直接通过互联网的其他途径获取所需内容。然后第二种解决办法是通过大学的代理服务器访问剩余的少数期刊，而这些期刊正变得越来越少"（A1F）。

预印本服务器的兴起也提供了获取信息的新途径，甚至缓解了人们对获取渠道的更大担忧（O2G）。O2G指出："我刚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真的很排斥预印本，觉得它们特别不靠谱，但我认为，预印本的使用或许也在改变人们使用文章的方式。"

3.5.2 对访问权丧失的担忧

人们常常会讨论有哪些替代方案，以及需要花多少时间来弥补访问权丧失带来的影响，不过有些参与者对此持有相互矛盾的看法。O2G认为，"四处寻找文章"会耗费额外时间，但"我会说，我的研究仍在以同样的速度缓步推进，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并不大，除了目前只是有点烦人之外"。其他参与者则有不同看法："现在，四分之三的情况下，文章都已经找不到了。所以会有些滞后。说实话，这很麻烦"（A1F）。一些参与者接受了无法获取文章的现实："很多时候，我就会想，'我拿不到这本期刊，那就只能不用了'"（O1F）；这甚至促使他们思考某个来源对自己的工作是否必不可少："我可能会想，'我真的需要那篇文章吗？'然后回头看看摘要，再重新评估我的研究问题，心想，'哦……也许它其实没那么重要'"（O2G）。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被指出的缺点是文章作者的可见度降低。

人们还表达了对可能受到不成比例影响的群体的获取方面的担忧，包括规模较小的学科、职业生涯早期研究人员和学生。一位参与者指出，初级教职人员"要获取他们赖以立足所需的各类研究成果，会面临更大困难"（O1F）。L2F提到："我记得，我最常无法获取自己想看的文章的时候，就是本科课程的学生在做研究时。"L1F也表达了对学生获取资源的相同担忧："我还有其他获取期刊的途径，学生却没有。"L1F还对规模较小的学科表示担忧："我担心，我以及想必其他身处规模非常小的学科领域的人，会成为最有可能失去获取所需期刊的机会的人

在大学里。”L3G担心取消期刊订阅会如何影响学生，以及这会如何影响他们对就读地点作出明智选择：

> “如果学生需要某个特定数据库中的重要信息来取得成功，那么在他们注册之前，就应该让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取这些内容，对吧？而不是等到他们已经读到课程一半时才告诉他们。”

机构对无法获取资源的接受程度，受到机构规模和财务状况的影响。参与者 A5G 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在 Andromeda U 这样一所规模庞大的研究型大学就读”，而 L3G 则指出：

> “我当时满怀期待地要去 Lyra U，因为那里有这么多工具，而且我以为自己能访问更多资源……后来我发现，许多我无法通过 Lyra U 获取的资源，其实可以通过[另一所大学] 获取……你会以为，在规模更大的大学里，什么资源都能获取。”

人们对获取资源的担忧，也受到无法获取资源的原因影响。一位参与者表示，如果“大交易”取消“是为了尝试改变一种商业模式……那么这种运营模式如今所体现的，也会影响那些希望获取科学资源、希望了解科学并对科学感兴趣的公民”，自己会更支持取消大交易。A5G 对于在本就不公平的科学体系中还要“为开放获取支付更多费用”表示不满（A5G）。他们担心，无法获取资源会影响研究的多样性：

>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些问题极其棘手且复杂，但它们也很重要，涉及研究可及性。也就是说，如果取消活动是为了尝试改变模式、施加压力，那就去做吧”（A5G）。

3.6 与图书馆的联系

3.6.1 与图书馆的关系和互动

受访者一致认为“图书馆……极其重要”（L2F），而且使用频率很高，不过他们与图书馆的关系性质会随时间而变化：“图书馆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常在图书馆消磨时间。只是我现在不再去书库了。上网更快”（O1F）。人们也通过不同的沟通渠道与图书馆建立联系；有些关系源于在 Twitter 等社交媒体网站上的互动，有些则来自专业环境中的近距离接触（O2G）。总体而言，每位参与者都表示与图书馆员关系良好，并感谢他们提供的服务；他们还指出，双方的职业价值观和兴趣相契合：“他们确实有着非常坚定的职业操守……怎么说呢，和我之前形成的那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理念完全相符”（A2F）。L2F 对图书馆员感同身受，认为期刊取消带来的后果令教职人员不满，而图书馆员首当其冲。

受访者与图书馆员的互动程度不一，从较少的互动——“我不会说这种互动非常、非常频繁”（A4G）、“彼此有一点熟悉”（L4G）——到较多的互动——“我们的图书馆院长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信息讲座，让我们了解有关这些捆绑订阅及其成本的问题”（O1F）。外联的形式也从咨询到合作不等。几位参与者提到，图书馆员常驻院系，并努力与教职人员保持联系、提供咨询：“她会出席我们学院的教师委员会会议。她会为我们的教职人员提供咨询”（O1F）。谈到这些咨询的频率，A2F转述图书馆员的话：“他们经常来找我们说：‘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清单。比如说，我们必须削减开支，那该削减什么？’或者反过来，实际上会问：‘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采购需求吗？’”参与者A2F还举例说明了他们所看到的图书馆员与教职人员合作的方式：

> “我们的图书馆员正在做他所谓的勘查，实际上就是整理他计划购买的所有书籍。他会把书的大致参考信息，以及类似封底的内容发给我们……所以，并不是他花时间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时间读完买下的所有书。然后这些内容被发给了所有教师。我觉得这非常有用”（A2F）。

3.6.2 教职人员在馆藏采购中的咨询与参与

大家一致认为，应征询教职人员的意见，尽管大家充分信任图书馆员的能力。例如，一位受访者指出，图书馆员很了解哪些重要期刊值得获取，因此在其他馆藏采购方面更常征询意见：

> “手册或书籍方面的咨询更频繁，期刊方面则少一些，因为我认为他们知道或了解哪些期刊比较重要。所以，我不记得他们曾联系我，询问我们是否应该订阅某某期刊”（A4G）。

一位参与者对图书馆员是否了解关键期刊持更怀疑的态度：“他们得深入钻研才行，而往往更容易只是浅尝辄止，问问哪些期刊最常被使用之类的问题，而不是深入了解哪些期刊对某个特定学科至关重要”（O1F）。

一位参与者承认，教职人员和学生还可以采取更多行动，参与图书馆采购：

> “我认为，就教职人员和学生提出需求的作用而言，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说‘嘿，这真的很重要’，图书馆员就会注意到这件事，并且可以着手推进；而且他们往往也愿意为此努力”（O2G）。

有些人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充分的参与机会：“我所在的图书馆委员会开会不太频繁”（A6F）。另一位教职人员描述了教职人员缺乏了解如何妨碍他们实质性地参与采购，但仍认为

应该征求他们的意见："只要教职人员能够提供有用的反馈，我认为他们就应该参与讨论"（L1F）。

3.7 确定期刊价值

调查问卷是图书馆员征求意见、制定取消决策时常用的方法。大多数教职人员认为，调查问卷有助于决定取消哪些期刊，以及如何填补取消后留下的空缺（A3G）；同时也有助于弥补图书馆员领域知识方面的不足（O2G）。一些人称赞图书馆员积极征求教职人员意见：

> "我知道她费了不少功夫去联系大家，还会稍微催促一下，以获取这些信息。当我……收到这样的请求时，我确实会作答。"（O1F）

另一些人则认为，调查问卷不足以详细说明某些期刊为何对他们的研究很重要（L4G；L5G）。L3G承认，鉴于大学规模庞大，个别咨询并非完全切实可行的做法：

> "我觉得，调查问卷确实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我认为，如果他们试图在作出决定之前……采访每一个人，那就永远也无法作出决定。"（L3G）

使用统计数据（例如下载量）被认为是评估期刊价值最客观的指标。L1F认为，引文的重要性不如使用情况，因为

> "我所在的领域没有哪种期刊的影响因子特别高，所以，诸如这些文章被引用的频率之类的指标，会因领域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因此，我觉得，机构内的人实际获取该期刊的情况才是重要的。"

他们认为，使用统计数据必须结合期刊成本来权衡："显然，如果一本期刊一年只要 5 美元，你知道，访问它的人数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当然，没有哪本期刊一年只要 5 美元"（O2G）。

3.8 开放获取

3.8.1 对开放获取模式的态度与顾虑

参与者对开放获取出版的态度和相关经历，揭示了研究人员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研究体系中游刃有余，以及他们如何决定获取和产出研究成果。参与者普遍对开放获取持肯定态度，不过有些人也乐于支持非开放获取出版物，前提是资金用于支持学术团体；例如，他们认为这些团体会利用订阅和出版的成本做一些"有益的事"（L1F）。O1F强调了开放获取对低收入国家的重要性，但对其前景并不抱希望：

> “我知道有不少国际同事身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开放获取对他们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让他们能够真正获取那些……我希望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不过……我也想养一条宠物龙，所以[笑]。”

教职人员对掠夺性（或欺骗性）出版存在诸多担忧（O1F；L2F）。一些参与者此前曾掉入掠夺性出版的陷阱（L2F）。L5G指出：“我们一直在进入这些雷区，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领域……我认为，在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教育和支持。但，是的，我会选择开放获取出版。”

一名博士生强调了培养学术素养的必要性：

> “学术素养，或者类似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甚至要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我觉得，我们所有研究生都确实需要认真审视这一点。我开始询问团队成员，这篇论文有很多作者，于是我说：‘有人邀请我们出版这项研究。这是期刊名称。我无法确认它是掠夺性期刊，大家有什么担忧吗？’”（L5G）。

一些人认为，开放获取是新瓶装旧酒——也就是说，同一个问题换了一种形式：

> “我和另一位同事或合作者有过很多次交谈，他实际上非常反对开放获取，这些交谈确实很有意思……我当时想：‘天哪，可知识获取怎么办？’后来听了他反对的理由……说到底，不过是把成本转嫁给别人。而最终赚得盆满钵满的仍然是出版商。”（O2G）

3.8.2 对开放获取出版的态度

文章处理费被认为是出版的一大障碍，职业生涯早期研究人员尤其如此。参与者 A5G 指出：

> “付费墙制度和开放获取制度确实会带来压力，即使对博士生也是如此。像我这样的博士生要发表论文时，会想：‘好吧，我要不要花 3,000 美元让我的论文开放获取？因为我知道，开放获取能让论文获得更多引文。我会增加引文数量、提高影响因子，诸如此类，这样以后找工作时也会更有竞争力。’”

O2G 提到，他们还是学生时，首席研究员会承担开放获取期刊的成本，以便他们发表的研究获得更多引文。文章处理费也被纳入出版渠道决策：

> “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这取决于你做多少研究、是否想以此为职业，以及计划发表多少成果，这些费用很快就会累积起来…… 如果我有 15 篇出版物，难道要为这 15 篇全部付费吗？”（L4G）。

一位研究生指出，研究人员缺乏出版费用支持：“我也意识到，转嫁给研究人员的成本会直接挤占研究经费，这是一个重大弊端”（O2G）。正如另一位研究人员所说，情况还因此变得更加棘手：“联邦层面的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SSHRC）经费，或省级的魁北克研究基金（FRQ）经费，如今都要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开放获取方式发表”（A2F）。另一位教职人员指出，学科之间的特殊性也是影响开放获取实用性的一个因素：

> “开放获取当然很重要，而且很明显，加拿大三大资助机构正推动我们全面采用开放获取，但目前开放获取还不足以满足我的工作需求，因为对我的研究领域至关重要的一些期刊并非真正的开放获取期刊”（O1F）。

O2G发现，与非开放获取期刊相比，开放获取出版具有引用优势；但他们也提到，开放获取出版时超出了页数限制两页，“这让我们花了400英镑”，尽管他们最终认为，“这几页上的数据和信息值得支付这些版面费所产生的出版费用”。

然而，除了高昂的出版费用外，参与者还担心开放获取期刊在科研评价中所占的分量。参与者A4G表示：

> “它们通常被视为二流期刊，问题在于质量和影响力。它们不会出现在常见的排名榜上，因此到了职称晋升的时候，它们就毫无分量。所以，不建议选择它们。”

同样，A6F认为，选择在哪里出版也有一种“生存层面的考量”。他们指出，尽管职业生涯早期曾感到有压力，必须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但开放获取出版“绝对是我现在想做得越来越多的事，因为我现在有了更多自主空间，也有了更多自由度”。另一位教职人员认为声望是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专业人士，你会知道自己希望在哪些期刊上发表哪类文章，因为这些期刊有声誉”（A2F）。其他人则更关注寻找适合自己研究成果的发表平台，称这对他们而言是最重要的标准，也是以身作则的机会：“我认为，作为领导者，我们应该言行一致……但我仍然认为，在最能触达你想要的读者群的期刊上发表更为重要”（O1F）。

4. 讨论

本节汇总了各主题中最重要的发现，并将其与实践联系起来。文中还讨论了大交易取消作为信息共享与交流过程的情况。

4.1 参与取消流程

关于取消决策及整个流程中的咨询与参与，大多数受访教职人员和研究生普遍认为，图书馆已充分征询他们的意见并向他们提供信息，不过，图书馆开展的调查问卷或询问往往会引发他们对削减资源的担忧

。一些参与者希望更清楚地了解，教职人员和学生提供的哪些数据对决策最有用。有些人即使寻求或找到了其他获取途径，也会特意提交馆际互借请求，以便向图书馆员提供某项资源需求旺盛的数据（例如 O2G 和 L5G）。与同侪相比，这些参与者通常更了解取消的背景，以及学术出版或图书馆系统。事实上，研究中观察到教职人员与研究生之间存在知识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对后者在学术出版系统中的能动性所造成的影响（O2G；L1F）。在这方面，有些人认为出版商有意保持不透明（A5G）。这确实是诠释不公的一个例子。Fricker（2007）在认识不公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下阐述了诠释不公：解释资源被有意隐瞒或模糊，从而影响个人理解自身社会经验的能力。这进一步凸显了这样一种观点：掌握更多信息的人能够更好地参与此类流程，使其更具协作性。参与者 L5G 提出了提高学术素养（关于学术出版及在学术界中发展的知识与能力）的必要性，而 O2G 则建议为研究生开展强制性的图书馆培训。培养研究人员的学术与出版素养，不仅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相关事务，也能支持图书馆员与教职人员合作，使后者更了解图书馆员在学术传播中作为把关人的独特职位

许多参与者表示希望帮助图书馆员，参与期刊采购和取消流程，或者认为自己有责任参与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O2G）。有些人觉得自己无法参与，因为他们不确定是否有人需要或重视他们的意见，或者觉得自己缺乏参与机会（A6F；L1F）。这表明，增加联系有助于图书馆提升教职人员和研究生的知识水平与学术素养，并更好地赋予他们提供帮助的能力。社交媒体、信息说明会和专业学会似乎都有助于与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建立联系、构建关系。同样，探索征求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对馆藏采购意见的不同方法，并让他们在馆藏流程的早期阶段参与进来，有助于让他们参与取消决策，并让他们了解图书馆目前的馆藏情况。

4.2 取消的经历及其影响

大交易取消对期刊获取的影响各不相同：一些教职人员通过个人渠道（如导师、同事、作者）寻找替代获取方法，说明期刊危机可能凸显人际网络的重要性，也使人们更加依赖资深学者和科学学会来提供获取渠道。值得注意的是，相互支持是应对获取问题的常见方式，这表明学术界可能正在跨机构、跨学科，甚至跨国家协调合作。研究生证言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他们依赖导师提供获取渠道。然而，即便如此，获取情况仍不尽相同：一些教职人员无法获取其所在编委会所负责期刊发表的资料，或遇到其他障碍。一些研究人员仍相对独立，通过图书馆目录以外的在线渠道（如 Sci-Hub、ResearchGate、Google Scholar、预印本服务器）寻找所需资源。一位参与者

表示：“我没有缺少任何东西。我不能说我的研究做不下去”（A6F）。一些受访者充分认识到，在平衡图书馆预算与采购所需期刊之间存在着矛盾，并了解其中伴随的挑战；另一些人则不了解预算方面的顾虑、采购流程、出版模式，甚至对期刊危机本身也一无所知。

此外，参与者还担心那些更容易受到取消决策影响的群体：规模较小的学科、职业生涯早期研究人员和学生。同样，参与者也认为自己缺乏申诉途径，而且关于资源需求的取消后调查遭到了忽视（A3G；A2F）。A6F 的情况是一个成功进行取消后沟通的例子：根据他们的反馈，资源得以重新购入。其他教职人员似乎也觉得，哪怕只是存在重新购入的可能性，也令人宽慰。图书馆员可以在决策和传达取消信息时优先考虑弱势群体，采取更直接、更深入的咨询方式，加强有关替代访问途径资源的信息传达，并在取消后跟进，以确定取消所产生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在取消后继续努力与教职人员保持沟通，也有助于减轻削减资源所带来的影响或反弹。

4.3 增进理解

如果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在意识形态上认同取消的原因，他们或许会更支持取消。例如，A5G 指出，如果他们知道取消项目旨在改变当前出版模式，就能接受由此带来的后果，例如失去对某些资源的访问权。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员可以尝试借助与教职人员和研究生的价值体系相契合的机会，与他们交流互动，以此作为争取支持，或至少增进他们对取消的理解的一种策略。因此，参与者认同图书馆员坚定的职业良知（A2F），并常常思考自己的选择会如何影响系统内的其他人。例如，O2G 会联系自己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其作品的作者，告知他们自己的作品正在被阅读。这体现了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做法，也说明教职人员如何采取变通办法，不仅解决获取问题，还确保科学机制不受干扰，例如学术认可（引文和可见度）。因此，取消的影响正在改变研究人员维护和践行科学规范的方式。这些发现表明，如果能与取消的原因建立道德或哲学立场上的一致，教职人员或许会更支持取消。

4.4 改变当前出版模式

受访者一致强烈认为，当前出版模式亟需改变。参与者讨论了开放获取这一学术出版领域的重要发展，但对于开放获取在获取研究成果而非发表研究成果方面的可行性，看法和态度各不相同。研究结果表明，开放获取是一种使用广泛且备受依赖的出版物获取替代方式。参与者认可开放获取的开放性，因此也注意到开放资源范围有限。由此，开放获取或可在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对大宗协议取消的担忧中起到调节作用。然而，参与者对于开放获取在传播知识方面的作用，态度差异很大。受访者反复指出，对科研评价和发表平台声望的顾虑，是影响.....的关键因素。

研究人员选择在哪里发表成果，并对开放获取的采用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评估改革是学术界目前高度关注的干预切入点（例如，科研评估改革联盟（CoARA）（https://coara.eu/）、研究评估宣言（DORA）（https://sfdora.org/about-dora/）；因此，本研究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当前研究评价体系是研究人员改变行为的重要障碍，尤其影响他们是否选择开放获取出版。

参与者采取的个人层面行动包括不再为特定期刊审稿，或选择不在特定期刊上发表论文。几位参与者（L3G；L2F）提出，可以由图书馆和资助机构担任出版商，以此收回控制权，并确保学术出版成本低廉。事实上，过去几年里，围绕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已相当丰富，推动这一方向发展的努力也日益增多（Bonn & Furlough，2015；Gwynn & Craft，2019年；Lippincott，2017）。

4.5 将取消视为信息共享与交流的过程 e

本研究还揭示了围绕大宗协议取消，以及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开展的信息共享与交流的动态。这些过程在某些资料来源与参与者之间是双向的（例如图书馆员与教职人员和研究生之间），而在其他方面则是单向的（例如教职人员阅读网站上的大学政策）。访谈数据显示，这些过程使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对大宗协议取消和学术出版的认知与了解程度各不相同。一些参与者对取消正在发生这一事实及其原因只有基本认知（例如L4G），而另一些了解更深入的参与者则更积极地投入其中，并希望参与这一过程（例如O2G）。本研究指出，关于学术出版和大宗协议取消的信息共享与交流，发生于多种信息渠道之中，包括大学网站和政策、图书馆员、同事、工作人员、学生、学术研究、高等教育杂志、社交媒体，以及参与者自身的学术经历。这些发现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利用这些渠道提升认知，同时促进知识建构（即理解并能够进行批判性参与，进而培养影响或推动变革的能动性），使其成为教职人员和研究生积极参与的双向过程。这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大宗协议取消和学术出版的理解，使其不再仅被视为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发生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并通过图书馆和机构之外的渠道展开。

5. 结论

本研究呈现了对来自三所加拿大中型大学的 13 位教职人员或研究生进行访谈所得的结果，不能代表高等教育机构所有教职人员的看法和经历。尽管如此，研究仍展现了教职人员和研究生的认知、知识、观点和经历，并深入探讨图书馆员和机构如何以更具协作性的过程推进大交易取消项目。

研究结果表明，科研评价文化以及学术终身教职和职称晋升要求会显著影响教职人员和研究生的出版行为。关于科研评估改革的文献十分丰富（关于科研评估领域当前的讨论和进展概述，参见 de Rijcke (2023)），科研评估宣言（DORA）（https://sfdora.org/）已促使资助方、出版商、机构和研究人员协调推动变革。然而，关于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在开放获取方面的决策过程与行为，还有许多有待了解之处。未来研究可探讨信息渠道，以及学者之间围绕开放获取和学术出版其他方面的信息交流过程。此外，还可进一步探讨开放获取和预印本服务器的兴起与大宗协议取消之间的交集。

几位访谈参与者提到，他们希望参与大交易取消流程，但不知道自己在流程中的位置，也不知道如何才能为图书馆同事提供最大帮助。深入了解教职人员和学生如何支持图书馆推动当前学术出版体系的变革，将有助于改进相互支持的实践。

5.3 总结性评论

本研究探讨了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对大交易取消的看法及经历。希望本研究能够促使人们反思教职人员和研究生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有关取消事项的信息接收者，也是取消流程中的合作者。随着图书馆逐渐放弃大宗交易，并继续应对不断变化的学术出版环境，掌握信息并积极参与的教职人员和学生或许会不再因取消决策而措手不及，能够更好地准备并配备必要条件，以便在取消后查找和使用资源，更加体谅图书馆员的职位，并有能力应对学术出版环境、推动有意义的变革。

6. 致谢

作者感谢 Toluwase Victor Asubiaro、Asen Ivanov、Nicole Delellis 和 Helene Bigras Dutrisac 对本研究早期阶段所作的贡献。

我们感谢《大学与研究图书馆》的编辑和审稿人提供的宝贵反馈与编辑协助。

7. 资金

我们感谢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为本项目提供资金。

8. 作者贡献

M. H. 数据整理、正式分析、撰写——初稿、正式分析、验证、撰写——初稿、撰写——审阅与编辑

S. C. 概念化、数据整理、资金筹集、调查、方法论、项目管理、软件、资源、监督、撰写——审阅与编辑

C. J. 概念化、数据整理、资金筹集、调查、方法论、项目管理、软件、资源、监督、撰写——审阅与编辑

P. M. 数据整理、调查、方法论、监督、验证、可视化、撰写——审阅与编辑。

9. 利益冲突

本项目不存在利益冲突。

10. 数据可用性

本研究报告的访谈数据已匿名化。出于隐私考虑，访谈记录和编码数据将不予公开。

11. 伦理审批

西安大略大学非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已批准本项目的研究伦理审批（# 114491）。

12. 参考文献

Ambi, A., Morgan, P., Alcock, E., & Tiller-Hackett, A. (2016). 利用数据拆分期刊套餐。循证图书馆与信息实践，11(4)，57-。https://doi.org/10.18438/B81K9B

Bergstrom, T. C., Courant, P. N., McAfee, R. P., & Williams, M. A. (2014). 评估大宗期刊捆绑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111(26)，9425–9430。https://doi.org/10.1073/pnas.1403006111

Bonn, M., & Furlough, M. (编). (2015). 广而告之：学术图书馆作为学术出版商。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下属分会）。

Botero, C., Carrico, S., & Tennant, M. R. (2008). 利用在线期刊使用情况比较研究评估大交易。《图书馆资源与技术服务》，52(2), 61–68.https://doi.org/10.5860/lrts.52n2.61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CARL）。（2016年2月3日）。加元走弱使期刊成本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再度受到关注。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
https://www.carl-abrc.ca/news/journal-costs/Cassady, S., Hare, M., Mongeon, P., & Johnson, C. 大宗协议取消及其对图书馆员决策的影响。《加拿大高校图书馆学期刊》*11*: 1–33.https://doi.org/10.33137/cjal-rcbu.v11.43905Clarke, V. & Braun, V.（2017）。主题分析。《积极心理学杂志》，*12*(3), 297–298。
https://doi.org/10.1080/17439760.2016.1262613

de Rijcke, S. 等，《研究评价的未来：当前争论与发展的综述》（2023）。DOI: 10.24948/2023.06https://www.interacademies.org/publication/future-research-evaluation-synthesis-current-debates-and-developments

Enoch, T. 和 Harker, K. R.（2015）。预算末日规划：连续出版物／电子资源取消方法的演变。《连续出版物图书馆员》，*68*(1–4), 282–289。https://doi-org / 10.1080/0361526X.2015.1025657

Frazier, K.（2001）。图书馆员的困境：思考“大交易”的成本。D-Lib Magazine，7(3)。https://doi-org/10.1045/march2001-frazier

Fricker, M.（2007）。诠释不公。载于认识不公。牛津大学出版社。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8237907.003.0008

Gagnon, S.（2017年）。期刊出版商的大型捆绑订阅：它们值得吗？ Papyrus。蒙特利尔大学。https://hdl.handle.net/1866/18507

Glasser, S.（2013年）。评估大型捆绑订阅：挑战、成果与建议。《电子资源图书馆学期刊》，25(4)，263–276。https://doi.org/10.1080/1941126X.2013.847672

Gwynn, D.、Henry, T. 与 Craft, A. R.（2019年）。馆藏建设即馆藏管理：图书馆作为出版商及其对馆藏发展的影响。《馆藏管理》，*44*（2–4），206–220。https://doi.org/10.1080/01462679.2019.1579012

Hardy, B. B.、Zimmerman, M. C. 与 Hanscom, L. A.（2016年）。无需咒骂的删减：一项成功的取消项目。《连续出版物图书馆员》，*71*（2），112–120。https://doi.org/10.1080/0361526X.2016.1196635

Hoeve，C. D. (2019年)。财政紧缩时期的资源管理：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估以取消期刊套餐（第 42–50 页）。Routledge。https://doi.org/10.1080/0361526X.2019.1576571

Howells, L. (2015年12月8日)。纪念大学将取消数千种期刊订阅。*CBC*新闻。
https://www.cbc.ca/news/canada/newfoundland-labrador/memorial-university-to-cancel-thousands-of-journal-subscriptions-1.3354711

Ivanov, A., Johnson, C.A., & Cassady, S. (2020), 《解绑实践：作为信息实践的大宗协议期刊套餐拆分》, 《文献学杂志》。https://doi.org/10.1108/JD-09-2019-0187

Johnson, Catherine Anne, and Samuel Cassady. 2024.《教师对期刊取消的回应》。《馆藏管理》49 (4): 165–85。https://doi.org/doi:10.1080/01462679.2024.2422589。

Jurczyk, E., & Jacobs, P. (2014). 有什么大不了的？国家层面的馆藏评估。《Portal》, 14(4), 617–631. Scopus。https://doi.org/10.1353/pla.2014.0029

Lemley, T., & Li, J. (2015).“大交易”期刊订阅套餐：是否物有所值？成本？《医学图书馆电子资源杂志》, 12(1), 1–10。https://doi.org/10.1080/15424065.2015.1001959

Lingard, L.（2019）。超越默认冒号：在定性研究中有效使用引语。《医学教育展望》, *8*（6）, 360–364。https://doi.org/10.1007/s40037-019-00550-7

Lippincott, S. K.（2017）。作为出版者的图书馆：新时代学术交流的新模式。*ATG LLC*（媒体）。http://dx.doi.org/10.3998/mpub.9944345

Lusk, J. T., Jones, K., Ross, A., & Lecat, V.（2023）。深入了解教职人员对开放获取的看法：对阿联酋教职人员的定量分析。《学术图书馆学新评论》, *29*（3）, 219–243。https://doi.org/10.1080/13614533.2022.2122853

McLean, J., Dawson, D., & Sorensen, C.（2021年）。向校园传达馆藏取消信息：一项定性研究。《大学与研究图书馆》, *82*（1）, 19。https://doi.org/10.5860/crl.82.1.19

McLean, J., & Ladd, K.（2021）。回购困境：我们如何制定基于原则、数据驱动的方法来拆分大交易。《连续出版物图书馆员》, *81*(3–4), 295–311。https://doi.org/10.1080/0361526X.2021.2008582

Mills, S.（2016年10月21日）。渥太华大学将数千种期刊列入砍除名单。*CBC*新闻。https://www.cbc.ca/news/canada/ottawa/university-ottawa-library-budget-journal-cuts-1.3815030

Mongeon, P., Siler, K., Archambault, A., Sugimoto, C. R., & Larivière, V.（2021年）。大交易时代的馆藏发展。《大学与研究图书馆》, 82(2), 219-。https://doi.org/10.5860/crl.82.2.219

Olsson, L., Lindelöw, C. H., Österlund, L., & Jakobsson, F.（2020）。瑞典研究人员对取消与爱思唯尔的大宗交易的响应。《Insights the UKSG Journal》，33(1)。https://doi.org/10.1629/UKSG.521

Owens, E. E., & Manolovitz, T. (2021年). R1 以外的学术交流：衡量博士/专业型大学教职人员和研究生的认知与兴趣。 图书馆学与学术交流期刊，*9*(1), eP2413-。https://doi.org/10.7710/2162-3309.2413

R 核心团队. (2022年). *R*：一种用于统计计算的语言和环境。 R 统计计算基金会，奥地利维也纳。 https://www.R-project.org/

Schiavo, J. H. (2024). 健康科学教职人员对学术开放获取和掠夺性出版的认知、态度与实践。医学参考服务季刊，*43*(3), 243–261。 https://doi.org/10.1080/02763869.2024.2373019

Strasser, S. (2017年1月16日). 知识价格不断上涨：卡尔加里大学削减1,600项学术资源。 *The Gauntlet*。https://thegauntlet.ca/2017/01/17/the-rising-price-of-knowledge-university-of-calgary-cuts-1600-academic-resources/

Urquhart, C., Lehmann, H., & Myers, M. D. (2010). 将“理论”重新引入扎根理论：信息系统扎根理论研究指南。信息系统期刊, *20*(4), 357-381. https://doi.org/10.1111/j.1365-2575.2009.00

Webber, N., & Wiegand, S. (2022). 关于教职人员对掠夺性出版的认知和态度的多学科研

Welhouse, Z., & Boock, M. (2023). 教职人员对开放获取出版的态度：图书馆主导的行动与推 10.1344/BID2023.51.11

附录

附录A：访谈问题

1. 在开始之前，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习／研究／教学领域、您的职业身份（或您目前处于博士求学的哪个阶段），以及您在 __ 工作了多久？

2. A) 您在工作中会使用期刊吗？它们对您的研究/教学有多重要？您觉得有哪些期刊对您的工作必不可少？大学是否提供这些期刊的访问权限？您所使用期刊的时效性有多重要——您是否需要获取最新发表的作品，还是在发表六个月或一年后再获取也可以？您是否曾经无法获取所需的资料？

B) 如果您无法获取所需的期刊，您会怎么办？能否谈谈您曾经不得不通过图书馆以外的方式获取文章的经历？与此相比，您会使用纸本期刊吗？（您上一次亲自去图书馆并使用纸本资源是什么时候？）3. 您是否曾要求图书馆订阅所需的期刊？您会向图书馆员咨询所需的资源吗？是否有特定的一位或几位图书馆员，您经常向他们咨询资源访问权限？图书馆员请教授指出重要期刊时，您有什么反应？您认为教授和博士生是否应该参与资源的遴选或取消？4. 如果要制定一份用于决定取消哪些刊名的标准清单（例如成本、使用情况、教职人员的使用情况、参考文献/引文、图书馆员的专业知识等），您认为哪些标准最重要？哪些最不重要？您对图书馆员管理图书馆馆藏的能力有多大信心？b. 您是否曾因取消一份或多份期刊的订阅而提出异议？5. 您是否了解贵校电子期刊订阅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否曾在贵机构内引发争议？您是否了解开放获取期刊？您认为它们是否足以满足您的研究需求？您是否曾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对于降低获取学术期刊的成本，您还有其他什么想法？6. 大量取消期刊订阅可能造成的后果中，您最担心什么？（如有必要，可询问您的希望/担忧——最好的/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7. 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学术传播模式：出版商免费获取内容、同行评审和编辑工作，然后向图书馆出售这些期刊的访问权限？

附录B：主题与子主题

主题与子主题	**Code出现**次
参与者	
职位	
院系或学院	
从业年限	
研究领域	
小计	*45*
对期刊危机的认知	
对期刊采购流程的认知	
对图书馆的商业模式顾虑的了解	
对其他大学应对期刊危机方式的了解	
期刊危机的信息来源	
小计	*57*
获取	
获取期刊的替代方法（包括非法和合法方法）	
获取图书馆未收藏期刊的示例	

关于获取的担忧（正面或负面）	
关于获取时效性的担忧	
关于获取成本的担忧	
纸质期刊的使用	
新冠疫情的影响力	
文章检索方法	
电子资源的使用	
小计	*180*
与图书馆的联系	
与图书馆员的关系	
图书馆员与教职人员的合作	
对图书馆员的信任	
参与图书馆采购（例如加入教师图书馆委员会）	
小计	*125*
取消项目	
与教师和学生的沟通	
对期刊取消项目的了解	
教职人员参与重要期刊的甄选（例如，填写教师调查）	
教师参与期刊取消项目	
对期刊取消的态度	
小计	*108*
期刊价值评估	
学科特定考量	
标准排序	
期刊对研究和／或教学的重要性	
期刊价值评估	
期刊价值评估——影响因子	
小计	*143*
Cost	
成本意识	
预算方面的顾虑	
小计	*98*
开放获取	
作者处理费（APC）	
在开放获取模式下发表（优点和缺点）	
对开放获取的顾虑（例如，掠夺性期刊）	
小计	*68*
当前出版模式	
对当前出版模式的态度	
降低期刊成本的替代方案	
改变教师出版行为的难度	
小计	*140*
总计	**964**